

# 唐代文士入幕藩镇的主客观原因析论

苑汝杰

(华北电力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2206)

**提 要:** 唐代进士资格的获取,也只是获取了入仕前的一种身份。要真正进入仕途,尚需经吏部铨选、制举或吏部科目选等,释褐非常缓慢。而藩镇的辟署之权、纳士方略为文人找到了另一条出路,使文士快速升迁,甚至自幕府直登朝堂。幕府优厚的薪酬,使文士生活相对优裕。章檄表奏的撰写与传播,满足了文士精神层面的需求。

**关 键 词:** 文士;入幕;藩镇;原因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2)03-0133-04

仕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永恒的文化选择。有唐一代,宦途有两条途径:一是吏部任命,一是藩镇辟署,而后者尤为文人所倾慕。探讨其原因,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唐代的科考与选官制度、唐代藩镇的纳士策略以及文人在幕府的生存环境。

## 一、登第与释褐

### (一) 科考艰难

追溯唐代科考考试及其艰难之程度,很容易想到唐代两位著名诗人孟郊和韩偓。孟郊一生,困苦潦倒,场屋蹭蹬,直到46岁才考中进士。《登科后》这首诗就是他的写照:“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虽脍炙人口,但笑中含泪。韩偓48岁登第后有诗“轻寒着背雨凄凄,九陌无尘未有泥。还是平日旧滋味,漫垂鞭袖过街西。”这首《初赴期集》诗貌似洒脱,实则苍凉悲惋,更加耐人寻味。孟郊“春风得意”也好,韩偓“漫垂鞭袖”也罢,迥异其趣的背后,都在诉说科考对读书人深入骨髓的心灵磨难。

尽管唐代进士科考每次试士,及第者仅百分之一二,但却是士人奋斗与进取的路径。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条》就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近乎拼了大半生。

《唐摭言》卷八记载的几位名人久战不胜的次数颇能说明科考的艰难。以辞赋著名的公乘亿、早修举业的许棠,都是咸通十二年(871)中书舍人高湜下及第。至此,公乘亿已经出入考场30次,许棠则有20余次。而顾况之子顾非熊,连战举场30年,最后中举还是因为皇帝的眷顾。普通人登第如此艰难,就是皇亲国戚有时也不例外。《唐摭言》卷一〇载,贵主之子刘得仁,自开成至大中三朝,出入举场30年,竟无所成。

进士及第已艰难若此,然而科考却存在诸如试卷不糊名、取舍顾及名望等弊端。洪迈《容斋四笔》对此记叙比较全面:“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有司,既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sup>[1]</sup>《卷5》这种失去公平竞争的科考,对权富子弟自然有利,而孤寒幽独之士则多致沉弃。《旧唐书·王起传》云:“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七六。”<sup>[2]</sup>《卷164》由上可见唐代士人取得

功名的艰辛。

### (二) 释褐迟缓

使尽浑身解数幸运登科,只是获得了入仕前的一种身份。若要得到官资,必须先通过吏部“判两节”的春关考试,然后方可参加多渠道的选官考试。如吏部铨选、制举以及吏部科目选等。吏部铨选,是及第者必须经历的入仕之路。及第进士的守选期一般为三年,而且铨选程序繁多,由此路入仕,缓慢而艰辛。韩愈《上宰相书》说“愈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但这毕竟是一条最有希望的为官之路。而制举考试,因为皇权的介入,使举制和选官合一,一旦登科,即可授官,且名扬天下,不失为一条显途。但制举考试时间不定,录取人数很少。至于吏部科目选,则是吏部铨选的补充形式。

科考的艰难甚至使读书人走上极端。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三《草贼号令公》载,李山甫,咸通中举进士不第,后流落河朔,为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从事,对朝廷执政多有怨愤,其诗“劝君不用夸头角,梦里输赢总未真”,抒发了他的愤慨与不平。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前宰相王铎被害于魏博,导因之一即李山甫“以咸通中数举不第,尤私愤于中朝贵达,因劝(彦祯子)从训图之”,将王铎一行全部杀害。有功名不能很快入仕,或为功名而结怨于社会,不但耽误了才俊为国家效力的机会,而且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 二、藩镇纳士与幕府升迁

### (一) 藩镇纳士动机及策略

唐代初年在重要各州设都督府,睿宗时设节度大使,玄宗时又在边境设置十节度使,通称为“藩镇”。各藩镇掌管一个地区的军政,后来权力逐渐扩大,兼管民政、财政,掌握全部军政大权。藩镇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有辟署之权,对于当时的士人来说,真是上帝在彼处关了一扇门,又在此处开了一扇窗。于是,众多文士潮涌般奔向藩镇,以致幕府人员成分十分复杂。关于幕府僚佐的身份来源,戴伟华先生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将其分为五类,即布衣、游客、方士、隐士、进士与明经及第<sup>[3]</sup> P80-89;宁欣先生的《唐代选官研究》归纳为:在职官员、选人、布衣<sup>[4]</sup> P104-105。

虽然幕府人员成分复杂,但藩镇对未来幕僚的选择并不草率。唐皇甫氏传奇志怪集《原化记》记载,张建封镇徐州时,辟李藩为节度府从事,奏官为巡官校书郎。有一新罗僧能相人,

预言张建功不能做宰相,张颇不快。于是令僧人看使府中何人能做宰相。僧人遍相诸从事,说无一人有宰相之命。张建功言道“某妙择宾僚,岂无一人至相座者。”及至李藩到来,僧人降阶相迎,对张建功说“判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不及。”张大喜。后来李藩果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sup>[5]</sup>卷77。

名士是幕府首选。为了延揽这方面的人才,幕府给予他们极高的礼遇。如乌重胤历任横海、河阳等节度使,“善待宾僚,礼分同至,当时名士咸愿依之”<sup>[2]</sup>卷161;张建功为徐泗濠节度使,“礼贤下士,无贤不肖,游其门者,皆礼遇之,天下名士向风延颈,其往如归。贞元时,文人如许孟容、韩愈诸公,皆为之从事”<sup>[2]</sup>卷140;李栖筠为浙西观察使,“虚心下士,幕府盛选才彦”<sup>[2]</sup>卷122;浑瑊历任振武、邠坊、朔方等节度使,“卑礼下士,召置幕府,得一时之人”<sup>[7]</sup>卷792;王拱为桂管观察使,爱令狐楚之才,以礼辟之,“惧楚不从,乃先闻奏,而后致聘”<sup>[2]</sup>卷172;牛僧孺初仕,十府奏取,“郗公士美以昭义军书记辟,凡三上请”<sup>[7]</sup>卷755;等等。

河朔跋扈藩镇,也积极招纳贤才。《新唐书·李石传》载,“德宗多猜贰,仕进之途塞,奏请辄报罢,东省闭阁累月,南台惟一御史,故两河诸侯竞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趋之,用为谋主,故藩镇日横,天子为旰食”<sup>[8]</sup>卷131。如魏博节度使“田悦招致贤才,开馆宇,礼天下士,外示恭顺,阴济其奸”<sup>[8]</sup>卷210。据中唐薛用弱传奇志怪集《集异记·刘元迥》载,平卢节度使李师古招延四方之士。“一艺者至,则厚给之”;晚唐李伋志怪杂事集《独异志》卷上《李师古幕客之厄》载,李师古暇日常宴其从者,在座者有名士皇甫弼、贾直言及王生、魏生十余辈。可见,李师古纳士,是不拘一格的。

对于藩镇力辟名士入幕的动机,唐人赵憬说“诸使辟吏,各自精求,务于得人,以重府望。”<sup>[5]</sup>卷138。南唐刘崇远传奇志怪杂事集《耳记》载,节帅王铎初秉戎钺,“方延多士,以广令名”。也就是说,名士在幕,能提高幕府的声望。而符载《送崔副使归洪州幕府序》更进一步道出藩镇妙择宾僚的实质。其文曰“今四方诸侯,裂王土,荷天爵,开莲花之府者,凡五十余镇焉,以礼仪相推,以宾佐相高,长城巨防,悬在一士。”<sup>[6]</sup>卷726。由此可见,为了强藩固藩,使府更视优秀幕僚为其钢铁长城。

## (二) 幕府捷径

许多藩镇依靠自己的幕府班子,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反过来又通过对幕府宾僚的举荐,培植自己的势力。因此幕僚快速升迁的机会是存在的。唐末尉迟枢小说集《南楚新闻》载,崔铉为荆南节度使李石从事,入拜司勋员外郎、翰林学士,两三年即拜中书侍郎平章事。李石仍旧在镇,其祝贺崔铉高升的贺状这样写道“宾筵初启,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在陶钧之下。”而李石其实何曾不是他人羡慕的对象。唐赵璘《因话录》卷三载,李石是庾承宣门生,后来李石为魏博镇幕僚,因奏事赐紫,而庾尚衣绯,所以时人说“李侍御将紫抵绯上座主”。据《旧唐书·李石传》,李石为人“机辩有方略,尤精术数,藩府称之”<sup>[2]</sup>卷172,所以迁高位。

藩镇在呈送朝廷的公文中,也表示过幕府升迁快速的内容,李商隐《为濮阳公陈许奏韩琬等四人充判官状》,谈到裴蘧时说道“伏以前任大理评事已三十三月,比于流辈,已是滞淹。”裴在幕府任大理评事(幕僚带衔)不足三年,较之一般人已显得“滞淹”不迁。可能李商隐所在幕府,“流辈”升迁较快。

幕僚升迁全赖使主的举荐。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德宗朝,赵璟两次被引荐做湖南观察使判官,因为官有美誉,被数次举荐,以至于位至湖南观察使。唐无名氏《大唐传载》记载,于良史为徐州节度使张建功从事,常吟诗感怀: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倚朱门,从来汗袍赤。于是张建功为之奏章服。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下服绯,七品服绿”,又,“三品以上金鱼袋,五品以上银鱼袋,开元以后恩赐绯、紫服例兼赐鱼袋,谓之‘章服’”。由此可知,于良史因张建功的表奏得到五品官职。

可以肯定地说,文士的幕府背景堪为日后为官之政治资本。中晚唐很多大臣、名相都曾有过幕府经历。吴宗国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一文中,根据两《唐书》有关列传,考出进士出身经过藩府辟举的宰要有以下数人:文宗时有杜元颖、李逢吉、李珣、杨嗣复、李宗闵、宋申锡、李固言、李训、舒元舆、李石、陈夷行等;武宗时有李固言、李石、李珣、杨嗣复、陈夷行、李绅、李让夷、崔铉、李回、郑肃等;宣宗时有李绅、李让夷、李回、郑肃、白敏中、崔元式、卢商、马植、周墀、裴休、魏謩、崔慎由、刘瑑等<sup>[9]</sup>。这足以说明,藩镇经历对于日后升迁的重要意义。白居易《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说“今之俊义,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于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sup>[10]</sup>卷49。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唐藩镇幕府》也说“唐世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辟署为重。”唐代后期宰相竟然有三分之二是登科之后从藩镇使府中辟署出身的。可以说使府辟署实际上已经成为中晚唐文人士子致身通显的捷径,达官显宦的摇篮。

## 三、幕府薪酬及其他

民以食为天。幕府薪酬较高也是唐代文士竞趋藩镇的一大原因。唐代幕府重要僚佐的俸料包括了钱财与米、面、绵、柴、马料等多项实物。由于两税法采取地方财政包办之法,有些藩镇及州县官员的俸料收入大大超过额定数目。据《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统计,贞元以前,一个带检校官的幕职,与朝廷同级正官的俸料相比,一般要高出一倍以上。如大历时,观察使每月除刺史正俸料外,每使每月请给一百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五十贯文。都团练副使,每月料钱八十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三十贯文。观察判官(与都团练判官同),每月料钱五十贯文,支使每月料钱四十贯文,推官每月料钱三十贯文,巡官准观察推官例,已上每员,每月杂给,准时估不得过二十贯文<sup>[11]</sup>卷91。

以上藩镇幕府人员一般所带官衔是郎中、员外郎。而朝廷的郎中月俸是“二十五贯文”,员外郎仅仅“十八贯文”。可见外官与京官薪酬悬殊。加之藩镇公然聚敛,幕僚的俸料十分优厚。《旧唐书》卷一八八《杨炎传》说“权臣猾吏,因缘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王寿南先生论述道,“是时(贞元)州刺史月俸至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官禄寡薄,自方镇入八座,至谓罢权。薛嵩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员外,求为洪州别驾;使府宾佐有所作者,荐为郎官;其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为外太重内太轻,乃请随官闲剧,普增其俸,时以为宜,而窦参多沮乱其事,不能悉如所

请”<sup>[12] P417</sup>。上述人等乐于出任外官,亦可见藩镇俸禄之高。另外,幕府宾僚若自愿离开府院,还有出院的“例钱匹缎”相赠。五代杜光庭《录异记》卷二《异人》载,王郢为凤州节度使满存幕僚,离幕时,满存“以出院例钱匹缎相遗,倍厚于常”,“又遗采缣锦绣之物及其家”。也是客外的所得。

润笔费是幕僚的额外收入。《唐摭言》卷一〇记载,李凝古为彭门时溥从事,为进黄巢首级撰写露布,获润笔费而不前往致谢,时溥不怪。靠撰写碑志获取润笔费可说是蔚为风气。唐末高彦休《志怪传》杂事集《阙史》卷上《裴晋公大度》载,裴度在洛阳时,以美词厚币,辟皇甫湜为留守府从事。裴度平定淮西,以钅万赏赐重修佛寺。佛寺修成,裴度请白居易撰写碑志。皇甫湜非常气愤,认为裴度是将自己这样的宝琴瑶瑟而比之桑间濮上,是对自己的轻慢,并坚决要求辞职。于是裴度改请他为碑志。事后裴度“以宝车名马,缙采器玩,约千余缗”酬谢。孰料皇甫湜大怒说,“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为此碑,盖受恩深厚耳。其碑约三千字,一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公开索要酬金;而裴度依数酬之。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隐仙亭》记载,“前使李给事名渤开置亭台……有从事皇甫湜、吴武陵撰碑碣二所”。与《阙史》所记比照,皇甫湜的确喜爱作碑志,可能在桂林使府,润笔费也是少不了的。

的确,撰写碑志,可以救贫。《唐国史补》卷中《求碑志救贫》载,王仲舒为郎中,与马逢交往甚厚。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有人则认为接受报酬,有辱清名。《北梦琐言》卷一二《柳大夫不受润笔》载,柳玭清廉耿介,笔法得柳公权之遗妙。为泸州刺史时,礼参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之撰德政碑。顾表示以润笔费酬谢,柳玭拒绝说“若以润笔先赐,即不敢闻命”。

#### 四、幕府书檄表奏

中晚唐时,藩镇战事不断,动辄兵戎相见,能够快速传达藩镇或朝廷态度的书檄表奏最为藩镇所重视,因此,那些文才出众的文士,多委以掌书记之职。而因精于此道、备受使主青睐者不乏其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士的写作,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

因为长于章奏表状,有的人会屡随使主迁转。如刘三复之于李德裕。《唐语林》卷三记载,刘三复为金坛尉时,李德裕镇浙西,三复代写草表,中有“山名北固,长怀恋阙之心;地接东溟,却羨朝宗之路”之句,借镇江北固山之名胜,及地接东海的地理环境,将唐朝江山稳固和藩镇恋慕朝廷的双重含义暗喻在文章之中,因此赢得李德裕嘉许,遂辟为掌书记。据《旧唐书·刘邺传》和吴廷燮《唐方镇年表》<sup>[13]</sup>,自穆宗长庆二年(822)李德裕镇浙西起,刘三复开始了其李府从事生涯,并长期追随李德裕:大和三年(829)德裕镇义成,四年镇西川,三复皆随之为从事。七年德裕入相,荐为主客员外郎。八年德裕再镇浙西,又从之。开成元年(836)任尚书员外郎,十一月三复随德裕镇浙西。三年德裕徙镇淮南,三复又相从。

而李德裕本人从未参加进士科考试,因为“厌恶其技浮华不实”,所以在他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833),因担忧“近世文士不通经术”,就改革进士考试,进士试议论,不试诗赋<sup>[14] J(卷244)</sup>。李德裕对自己的观点也是身体力行,他尤其善作诏书表状,今存其《会昌一品集》,不仅收录了他于会昌中任宰相

时自作的大量诏敕、论事状等,还有不少代人所作书。如《代刘沔与回鹘宰相书意》《代符澈与幽州大将书意》《代宏敬与泽潞军将书》等,均是内外战事中代藩镇或领兵军将所为。《北梦琐言》卷五《淮浙解纷诏》云,“李太尉破昭义,自草诏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郑文公自草高太尉诏,皆务集事,非侵局夺美也。”李德裕与郑畋的自草诏敕,并非显其所能,而是特重其事。

正因如此,刘三复和李德裕可谓志同道合,因此宾主相得,感情深厚。据《北梦琐言》卷一记载,二人有一致的写作理论主张,即“文理贵中不贵其速”。李德裕还将自己的文集送与刘三复,刘“乃体而为表,德裕嘉之,因遣诣阙求试,果登第,历任台阁”。而据《唐语林》卷三《赏誉》记载,刘三复娶妻,也是李德裕玉成。后来李德裕贬死朱崖,刘三复之子刘邺为德裕雪冤,以朱崖神梯归葬洛中,以报先恩。

而李德裕的政治对手令狐楚,更是唐中后期章奏大家。他年少时即学属文,因随父在太原,故相继为河东节度使李说、严绶、郑儋所聘,自掌书记至节度判官。节度使郑儋暴卒,军人哗变,白刃逼迫令狐楚草遗表,令狐楚从容作出令军士感泣的动人篇章,军心亦因之大定。《旧唐书·令狐楚传》云,“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他的章奏能为德宗辨认出来,说明其文风自成一格。元和十三年(818),令狐楚任华州刺史,其主持的秋季州试,将“杂文”放在第一场。《唐摭言》卷五《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明确写道:“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特置五场试:第一场杂文,第二场诗歌,第三场表檄。”也就是说如果“杂文”考试不过关,其他科目无需再试,可见令狐楚对书檄表奏等杂文的重视。

也有人因会写表奏而解决了生计问题。唐卢肇传奇志怪集《逸史》载,贞元中文士孟员外,因“少时应进士举,久不中第”而投亲长安,遭白眼以至寄宿马厩。恰逢国家多难,朝廷派禁兵将为贼境观察使,需人撰一谢表。孟员外因谢表而被聘请为幕府从事,“知表奏,数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故事主人公为乡贡进士,乃无出身之人,却仍被藩镇辟用,这也反映了当时藩镇急需应用写作人才的实际情况。

有特点的幕府章奏表檄,往往传播开来。文人因此而扬名,幕府应用文写作水平也因之提升。

如上述崔铉拜中书侍郎平章事时,李石驰笔相贺,贺信乃掌书记李肇撰写,其中“宾筵初启,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存陶镭之下”为时人广为传诵。李肇小说集《国史补》卷上《于公异露布》记载,于公异建中末(783)为李晟招讨府掌书记。兴元元年(784),李晟平朱泚之乱,收京城,公异为露布云,“臣已肃清宫禁,祇谒寝园。钟虞不移,庙貌如故”,德宗览之泣下,左右六官皆呜咽。议者认为朝廷捷书露布,无如此者。

有些表状,如写的有歧义,则引人遐想,成为别人的笑谈。南唐刘崇远《耳目记》载,武宗患心热疾病,食恒州所产紫花梨病即转轻。李遵来为恒州掌书记,作《进梨表》云,“紫花开处,擅美春林。缥蒂悬时,迴光秋景。离离玉润,落落珠圆。甘不待尝,脆难胜口。”表送达阙下,公卿见者,多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进残梨于天府也?盖以其表有脆难胜口之字。”

唐代文士竟趋幕府绝非偶然。登科艰难与释褐缓慢阻碍了文士的仕途,而藩镇的积极纳士与幕府资源优势恰恰为文士提供了出仕的机会和出路。当然,幕府优厚的薪酬与润笔费等,更使文士生活相对优裕。同时,章檄表奏(下转第169页)

米利都学派等提出了自然的、物质的秩序;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等对秩序都有阐述。中世纪甚至把世界的秩序看成是神授的秩序,正如圣奥古斯丁所宣称的“没有什么不是发生在秩序之中”。托马斯·阿奎那说创建秩序的能力是智慧的标志。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史证明,虽秩序不断被冲撞、打断、破坏,但人们为恢复秩序所作的努力和探索,都在证明着一个显见的真理:有序总是比无序更有助于人类!法律与秩序具有天然的媒因,“法律是秩序的化身”、“法律是秩序的象征”的命题一直为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所推崇。秩序体现在法律上,就是法律体系、结构的有序化,“秩序这一术语将被用来描述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特别是在履行其调整人类事务的任务时运用一般规则、标准和原则的法律倾向。”<sup>[18]</sup>刑法最为重要的机能之一就是对社会保护,通过刑罚惩罚犯罪,从而实现对社会的利益保护,维护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而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监狱秩序的问题,“监狱秩序是监狱在对罪犯执行刑罚的过程中,在一定政策的指导下,树立正确的刑罚执行观念,有条理、有组织地安排各种行刑制度以使监狱管理、教育改造和对罪犯的奖惩达到正常、安全、良好、稳定的一种状态。”<sup>[19]</sup>对法律秩序的划分,“最有效的划分是将其分为权利秩序和权力秩序,……这是对法律秩序进行法治分析的最理想的结论,也是制度模式实现后的必然结果。”<sup>[20]</sup>在监狱特定封闭的场合中,秩序意味着明确的规章制度、可以预期的改造前途、鲜明的奖惩内容、合理而有保障的生活。设若刑罚呈现无序化,无法合理、合法地设定好权力秩序与权利秩序的关系,势必会导致刑罚制度过于模糊、过于宽泛、弹性较大,增加处于不对称地位的罪犯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因之带来的对秩序的破坏力量迟早会爆发出来,以至严重影响监狱秩序的有序化。秩序作为一种重要尺度,对依法治监的水平、规模和质量有明显的衡量意义。秩序的合理化、合法化及其稳定程度愈高,愈是标志着法治水平愈高;秩序受到侵犯、扭曲或破坏,标志着内在弊端或不同程度的刑罚危机。

注 释:

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监狱并不是唯一的刑罚执行主体。依据现行刑法,刑罚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罚金、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等种类,上述刑罚只有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以及死

刑中的缓期执行是在监狱执行,但此类刑罚在现行定刑结构中又居绝大多数之地位,因此,可以说监狱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行刑主体。

参考文献:

- [1] 见百度词条解释, <http://baike.baidu.com/view/65647.htm>.
- [2][3] 参见郭理蓉. 刑罚政策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238-239.
- [4] (美) 阿列克谢·英格尔斯. 人的现代化[M]. 殷陆君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4. 转引自徐莉. 和谐社会中公民的法律理念[M]. 厦门: 厦门出版社, 2009: 9.
- [5] (美) 罗纳德·桑德斯. 美国公务员队伍: 是改革还是转型[M]//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交流合作部编. 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评述. 北京: 国家行政出版社, 1998: 264.
- [6] 韩玉胜, 刘崇亮. 监狱惩罚技能及其限制[J]. 犯罪与改造研究, 2010 (4).
- [7] 郭理蓉. 刑罚政策现代化[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 [8][9] (英) 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 黎廷弼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220-242.
- [10] 参见李泽厚. 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81.
- [11][12]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101, 103.
- [13][14][15] 公丕祥主编. 法理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565-93, 93.
- [16] 陈兴良. 刑法的价值构造[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62-65.
- [17] 见百度词条解释, [http://baike.baidu.com/view/3102.html?tp=0\\_11](http://baike.baidu.com/view/3102.html?tp=0_11).
- [18] (美) E. 博得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 邓正来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206.
- [19] 韩玉胜, 刘崇亮. 监狱惩罚技能及其限制[J]. 犯罪与改造研究, 2010 (4).
- [20] 王人博. 程燎原. 法治论[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226.

作者简介: 王传敏(1971—)男, 江苏赣榆人,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博士研究生, 招标师, 中级导游员, 旅游操作师, 安全工程师。

责任编辑: 志文; 校对: 宁远

(上接第135页)

的撰写与传播,也满足了作为文化人精神层面的追求与需求。对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宏观上的梳理和分析,基本理清了唐代文士纷纷倾慕藩镇幕府的时代背景和主客观原因,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宋) 洪迈. 容斋随笔[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2] (后晋)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3] 戴伟华. 唐代幕府与文学[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1990.
- [4] 宁欣. 唐代选官研究[M]. 北京: 天津出版社, 1995.
- [5] (宋) 李昉等.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6] (宋) 李昉等. 文苑英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 [7] (清) 董诰等.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影印本.

- [8] (宋)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9] 吴宗国.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 [10] (唐) 白居易. 白居易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1] (宋) 王溥. 唐会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2] 王寿南. 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M]. 台北: 大化书局, 1978.
- [13] 吴廷燮. 唐方镇年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4]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作者简介: 苑汝杰(1966—)女, 文学博士,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 竹君; 校对: 三川